

雄安“三变”能否突破城市发展瓶颈

■ 彭飞 时评人

日前，雄安新区定了三条原则，“绝不搞土地财政”“一定考虑百姓长远利益”等内容格外引人关注。不过，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不搞土地财政，哪来资金推进城市建设？征地一次性完成，农民怎么长久获益？官方的最新消息，给了这些疑问以回答。解决思路可以概括为“三个变”：变土地平衡为城市平衡，变政府争利为让市民获利，变产权少数人拥有为社会共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以地生财”和“以地融资”，构成了城市“以地谋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带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亏两头，富中间”：农民的征地补偿低于土地的增值收益，城市居民成为高房价的接盘者，而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则拿走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

必须承认，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土地在其中发挥了“启动器”“发动机”的作用。上述模式推动了我国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但消极影响也同样存在。如何扬长避短，是摆在雄安新区面前的课题。

了解旧模式的弊端，就更容易理解雄安新区思路为什么是“三个变”。变土地平衡为城市平衡，是指政府不再主要靠卖地为生，而通过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扩大就业水平，在税收中扩充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变政府争利为让市民获利，则是指不搞一次性征地补偿，更要抑制过高的房价，真正让处于两头的老百姓共同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巨大收益；变产权少数人拥有为社会共有，这一条尤为关键，是实现以上两个思路的基础。

根据新思路，未来土地使用权将由政府和农民共有，以往的房地产开发商变为“房产”开发商，不再拥有土地使用权。这就相当于政府和农民以土地出资，折成股

份，成为城市的“股东”，而房产开发商则投入资金和技术进行开发，最后土地增值的收益在政府、农民和开发商之间进行分配，大家共享城镇化发展的蛋糕。那么，踏入城市的创业者怎么分享这块蛋糕呢？新区设想采取积分制，刚开始先租房住，等工作一段时间，积分达到要求后，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房屋，打消居无定所的后顾之忧。换句话说，创业者以自己的劳动作为出资，也一同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

在这个意义上，雄安新区或将再造一套新的城镇化红利分配机制。政府和百姓成为城市的“股东”，其它参与城市建设的主体，则以自己不同的资源和特质作为投入要素，最终大家共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这既避免了“亏两头，富中间”的不公，也为政府进行城市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雄安新区建设的思路，正逐渐清晰。但这毕竟是初步思路，其中涉及更多具体而

复杂的制度设计，需要细化落实，也需要处理政策法规的衔接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老问题绕不开，新问题也可能不断涌现。比如农民的土地由于质量、区位、用途的不同，将来产生的收益肯定不一样，怎样确保农民之间的分红更加公平？积分的规则如何设计才更加合理？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分红比例又该如何确定？一系列问题虽然棘手，但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却可能是这些制度创新的最佳试验田。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有多少当初不敢想、不敢试的新举措率先在地方落地，最终推向全国。试点先行—系统评估—全国铺开，已经成为中国推进改革的重要经验和方法。而雄安所具有的独特政策资源、战略地位乃至历史方位，为尝试突破今天城市发展的瓶颈打开了空间。城市终归还是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期待雄安给出新的答案。

“共享单车”如何“计划生育”

■ 吴江 自由撰稿人

面对共享单车迅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北京已于9月15日发布《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单车的指导意见（试行）》。与4月份的征求意见稿相比，该《指导意见》明确，各区要落实自行车停放区设置；共享单车企业应配备与车辆投放规模相匹配的管理人员，做好现场停放秩序管理和车辆运营调度，及时清理违规停放车辆，对废弃车辆必须及时回收。同时，全市对车辆投放进行总量调控，实行动态平衡。在此一周前的9月7日，北京市交通委已宣布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北京也成为第12个叫停共享单车投放的城市。（9月18日《新京报》）

有道是“过犹不及”。共享单车为城市交通带来了新气象，但其扎堆乱放，却又成了新的棘手难题，不少城市甚至出现了怵目惊心的共享单车“坟场”。假如任由共享单车自由率性的发展下去，过度投放的共享单车会否如“蝗灾”掠境，要说并非杞人忧天。以北京为例，共享单车的存量已达235万辆，近4个月便新增了165万辆，地铁口写字楼已是车满为患，从城市管理的角度要求各企业停止新车投放，针对共享单车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并不多余。

应该说，共享单车究竟该不该增加，多少保有量最为合适，的确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仅与人口和交通需求息息相关，不同的利益视角，更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从用户角度出发，共享单车当然多多益善，单车投放量多，自然回收到的用户青睐，多半也与用户数成正比；而从共享单车运营方的角度出发，则更看重增加单车投放会否带来更多的收益或数据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共享单车的确可能有一个最佳的保有量，但假如简单的以一个数字作为指标而叫停各家企业的车辆投放，也难言公平。毕竟，共享单车行业存在着激烈竞争，假如新进的挑战者不能增加车辆投放，必然意味着劣势，并眼睁睁看着自身竞争力的丧失，而这显然并不利于公平竞争与行业发展。不仅如此，禁止新车投放的治理对策，其实也很难操作，按照规定，一旦发现立即予以现场封存，并作为企业违规行为记录在案。但如何认定新车，其实并非易事，一旦禁令的操作性欠佳，其约束力和执行情况，恐怕都将乏善可陈。

此外，共享单车究竟存量多少最佳，即便真有这样一个最佳点，其实也不可能由交通管理部门给出。共享单车的最佳保有量，更应由市场调节来决定。不难设想，假如共享单车经营者完全可以自由进出，车辆少了，自然会吸引新车投放，车辆过多，使用率下跌，运营方也自然没理由继续随便“烧钱”投车，而保有车辆损坏的更替，也同样离不开新车的投放。可见，一座城市共享单车究竟该有多少辆，完全可以更多依赖市场的调节功能，而不必管理方过于操心。

当然，共享单车的保有量不必行政设限，并不意味着对共享单车乱堆乱放的放任自流。对于管理部门而言，其实更应出台共享单车运营规范，对于共享单车的停放、运维管理设定严格的标准与监管策略。至于共享单车的最佳保有量及是否投放新车等微观决策，本是市场强项，当然不妨交给市场自己定夺。

食品安全考核重在依法问责

■ 廖海金 财经评论员

近日，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见》。意见提出，严格食品安全考核评价，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年度综合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9月18日《中国医药报》）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食品安全工作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态势总体向好。然而，食品安全事件仍常有发生。究其根源，不啻与制度设置不科学有关，更与我们对地方党委政府及其官员考核问责不力有关。因此，完善食品安全责任制，把确保食品安全工作成效作为衡量地方党委政府和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已迫在眉睫。

其实，就国家层面而言，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已有制度设计。2015年10月1日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提出了明确要求。去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明确从去年起对省级政府的食品安全工作进行评议考核。不难看出，此番河北《意见》提及的“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年度综合考核”即是对国家法规的具体落实。

应当承认，在当前诸多工作已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情况下，河北等地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评议考核，彰显的是“敬畏生命”与“敬畏健康”的意识，令人充满期待，也颇具积极意义。此举，无疑为省级以下地方党政主管戴上了一道“紧箍咒”。

笔者认为，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党政评议考核，实质上是一种问责制度的设计。而问责有效的基础是权责划分清晰。需要注意的是，食品安全考核只是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评价的一部分，食品安全责任占比的界定，直接关系到此项考核力度的大小，如果比例失衡，制度初衷将打折扣。以此而言，只有在国家食品安全考核的大方向下，进一步细化责任落实机制，层层传导、压实责任，政策效力才能不折不扣地发挥作用。

保障食品安全，本来就是地方党委政府应尽之责。最及时、最有力的问责能够促使地方党政官员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更有利于激发“一把手”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从而形成“龙压阵，九龙治水”的良好格局。反之，如果缺乏必要的问责措施及效果，考核就很可能成为“纸上谈兵”。因此，我们迫切期待着更有针对性、操作性、执行力的食品安全问责制度落实，以问责制度体系的有力保障，让考核真正发挥出“指挥棒”作用。

具体而言，首先，只要食品安全出了问题，上级党政就应该启动雷厉风行的问责机制，不拖拉，不护短，不徇私，透明公开。不能像以往一样，等媒体批评后，再去“慢慢处理”。

其次，从国家层面来看，对于食品安全监管者的失职或渎职行为，也有待引入司法领域，追究法律责任。毕竟，考核属于行政内部的评价，在权责划分上容易引发争议，做好行政问责与司法裁决的衔接，激活司法力量，既可保障问责的公平，又能确保法律对于地方党政及监管者漏洞的威慑。

此外，为保证考核的公正性，有必要通过参与机制建设，引入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众、舆论在内的第三方力量参与到考核中来，增加民意的分量，打破考核的“唯上”倾向。所以，强化第三方力量的监督权，“倒逼”问题的公开化是夯实考核效力的必要举措。

戏画闲言

有错必纠！清退扶贫违纪款

■ 吴之如·文并画

《广西日报》报道，近日，柳州市柳江区召开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专项工作会议，对侵占民生资金清退现场会，现场向4个单位（集体）和15户群众清退违纪款近70万元。

中国的扶贫工作，面广量大，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受到城乡贫困群体民众的欢迎。这是现代化道路上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无论遭遇多大的艰

难险阻，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仗，使人民增强奔小康的信心，使国家走向强盛和繁荣。

但是，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许多年来，腐败的祸水也流向了扶贫领域，因而反腐败斗争就是各地历史进程中都不容回避的重要一环。这则报道说，当地纪检部门“从从严从重从快纠正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吃拿卡要、与民争利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追究了一批扶贫工作不力的党员干部，惩处了一批滥用职权、雁过拔毛、贪污索贿、截留私分、挤占

乐见属地新政给网约车“拆墙透绿”

■ 邓海建 媒体人

9月18日，福建泉州市交通委公布了《关于印发调整完善泉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对泉州现有的网约车细则进行调整完善，在泉州地区网约车准入车型等方面，大幅降低了要求。此举赢得了司机与乘客的一致叫好，泉州也成为全国首个调整网约车政策的城市。（9月19日《海峡导报》）

一招破局，满盘皆活。

车价从15万降至10万左右，卫星定位不再要求“北斗”……网约车新政“泉州版”轻盈转身，这惊喜简直让老司机们有些措手不及。因为，若死守“15万”的门槛，泉州9成以上的网约车司机必将失业；而繁复的充要条件完全匹配起来，网约车这个行当基本只能“博物馆见”了。如今，沉疴散去千帆过尽，“全国首个调整网约车政策城市”之大刀阔斧，能在属地新政中形成正向的羊群效应吗？

事实上，自去年交通部联合七部委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来，除直辖市外，已有24个省份

发布网约车实施意见，133个城市公布出租汽车改革落地实施细则，还有86个城市已经或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无论是正襟危坐的“兰州新政”，或者是大刀砍下的“包头新政”，抑或是略显轻松的“成都新政”……属地管理固然是事权所在，却始终被舆论与城市气质、公共治理等关联在一起考量。

当然，“搅局”的网约车在打破地方利益平衡的时候，部门管理者有些“急吼吼”的心态，亦是情有可原，但，今年以来的三种风向，实在值得严苛的属地制度多费思量：第一，新经济从时髦热词变为寻常语汇，平台型就业屡被顶层设计提及，“包容审慎”成为行政部门耳提面命的要求，共享与创新成为实体经济逆势上扬的支撑——纵使网约车自己不会说话，经济大势与时代潮流亦不会缄默不语。此前的金砖峰会上，不少工商界大咖亦表达了新经济非零和博弈的共识。

第二，事实可能归谬了严苛新政的善意。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6月，北上广深四地早晚高峰打车难度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12.4%、17.7%、13.2%、22.5%。“全国网

约车用户超2亿人、而全国只有不到10万名合法持证上岗的网约车司机”已成为央媒反思打车难、打车贵的客观要素。公共政策在“管活”与“管死”之间，恐怕更要修炼好平衡术。

此外，属地新政的合法性审查，已成为越发强烈的程序吁求。今年4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16）》提出，各地方城市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为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驶员设置了高标准，窒息了网约车的发展，不仅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更不符合共享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一项事关千万人出行的公共政策，见仁见智不是坏事，死不悔改才最诡谲。值得肯定的是，泉州新政已然转身，这个非典型性属地新政的样本，或可成为其他城市践行善政之殷鉴。传统出租车改革迟早云起风涌，网约车产业布局业已悄然转身，在这个唯变不变的时代，属地新政早点给网约车“拆墙透绿”，赢得的不仅是城市新经济的先机，还有更多价值层面的共赢。

严禁高毒农药“亲近”果蔬

■ 杜才云 职员

山东省近期将对全省蔬菜水果质量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使用高毒、剧毒农药的，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9月17日新华网）

众所周知，果蔬在生长过程中会生病或发生病虫害，施用国家标准农药除虫治病，是为了确保果蔬质量达标、稳产高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家将食品安全提到很高的高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

理念，更是对食品及其原材料安全的一个顶层要求，有关部门须认真执行、认真检查，杜绝含有高毒、剧毒的农产品流入市场；作为果蔬等农产品的提供者更须对照落实，不得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高毒、剧毒农药。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还不容乐观。据新华社济南8月31日电，山东寿光农户127只羊，吃了来自辽宁沈阳一种植户产的大葱后死亡。随后，寿光市卫生检疫站工作人员在喂羊的大葱叶中发现了甲拌磷、毒死蜱等剧毒农药成分，毒葱的种植户已被捕。羊比人的

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

■ 胡海升 财经评论员

有学者曾发问，意大利北部的小城邦何以在14到16世纪发展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当年，荷兰作为“弹丸小国”何以能够抵御西班牙的强大武力？英国又何以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深入研究历史后，他得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金融。“世界是部金融史”，类似的说法虽有偏颇，但也道出了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

只不过，金融也是一把“双刃剑”。20年前，亚洲多个经济体的货币如推倒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贬值，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至今仍然是许多国家不能淡去的记忆；近10年前，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地，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直至今日，世界经济依然在亚健康状

态，这更是让人深刻感受到了金融的“双刃剑效应”。如何既让金融服务经济发展，又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考验着每一个国家的治理智慧。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论断，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指出了根本思路，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据统计，金融业已经成为28个省（区、市）的支柱产业，对其中12个省（区、市）的GDP拉动率超过1%。但金融业的过热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譬如资源配置不当，资金“脱实向虚”，潜在风险隐患增多等。相反，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的实体经济，则在发展上出现瓶颈。主要

体现在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弱，小微企业发展缓慢等。

一个国家要想保持长久经济竞争力及较强的综合国力，必须夯实实体经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国都把实体经济摆到了战略高度大力发展。对中国而言，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夯实根基并提升经济质量，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的不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的门槛与成本，让金融活水更好浇灌实体经济，不仅是做大做强经济“蛋糕”的根本选择，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必由路径。可以说，只有回归本源，全心全意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体现金融作为经济“血脉”的真正价值。

让金融回归本源，需要发挥“协同效应”。对金融监管机构而言，应加快完善金

高生产地果蔬抽查检测密度，将不合格农产品销毁，决不允许上市，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其二，对高毒、剧毒农药的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实名制通报制度，严禁果农、菜农购买；其三，要对滥用农药的种植户严格处理，发现违法使用农药的要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责；其四，要加大果蔬行业协会管理，以高标准规范辖区种植户，强化溯源管理；其五，建立应急机制，生产地所在省要做好有毒农产品回收、受害者赔偿等工作，以积极作为维护好社会稳定。

融监管体系，夯实金融监管存在的薄弱环节；对各级政府而言，应健全法律机制，增加恶意违法违规的成本；对金融企业而言，应完善公司治理，切实提升董事会、监事会履职能力和决策监督水平，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和竞争力；对实体经济而言，一方面要苦练内功，主动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主动与金融市场对接，充分发挥金融优势，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实体强，则国强；金融稳，则经济稳。我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也必将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我们必能让金融更好地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